

专家接受检察日报采访,就中央综治委更名作出解读: 中央对加强社会管理空前重视

日前,中央决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并赋予其协调和指导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职能。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周永康主持召开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策部署,切实履行各项职责,协调各方面力量,推动解决社会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作出新贡献。

更名是中央综治委履行新职责的开始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管理学者认为,中央综治委更名,就是中央对加强社会管理工作空前重视的反映。

从“治安”到“管理”,不只是两个字的变化。9月25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央综治委更名,意味着其由原来单纯的社会治安管理、打击犯罪功能,到如今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功能转变,其内涵更加丰富,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更加强调社会管理工作,体现了中央对社会管理的高度重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认为,中央决定中央综治委更名并对其职责、任务、成员单位进行调整和明确,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大决策,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从“治安”改为“管理”,是创新社会管理的新方式,凸显了社会管理的以

人为本。受访专家也表示,更名是中央综治委履行协调和指导社会管理工作新职责的开始,其成效还有待在以后的工作中去检验。

专家:更名后的主要任务已明确

更名后的中央综治委协调和指导社会管理工作的重点,正如周永康所强调的,主要包括如何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如何夯实基层基础,使绝大多数的矛盾和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如何在基层、解决在基层;如何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如何完善城乡应急服务管理体系,提高突发事件、事故的处置水平;如何建立健全信息网络服务管理体系,实现信息网络健康有序安全发展;如何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培育良好社会心态;如何建立健全社会诚信制度,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如何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从源头上、根本上改进社会管理,等等。

李成言认为,周永康同志讲

话中的几个“如何”,可以说就是中央综治委更名后的主要任务。其工作成效需要我们在后续的发展中来研究。因为社会管理也是一个发展的命题,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取得进步。我们期待中央综治委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汪玉凯称,中央综治委更名,是个良好的开端,我国要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取得实效,需要在思维和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有所突破。汪玉凯说,社会管理的本意不是“管”而是“服务”,其核心要义是通过有效的社会服务保障和维护群众权益,从而实现社会稳定。

李成言表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要的是更新管理理念,更好地落实党的惠民政策,实现人民的利益。如果人民的利益实现不了,社会管理就是一句空话。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表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是社会管理体制变革,尤其要重视五个方面的改革,即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会维稳体制、社区管理体制、社会服务体制、社会维权体制改革。据检察日报

对话

竹立家:深刻理解“管理创新”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现代快报:从“治安”到“管理”,变的不仅是两个字,这种变化带来了新的期待。

竹立家:治安是维持社会的安全,包括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劳动安全等。治安主要是政府提供公共安全服务。“社会管理”,可以说不光是治安,比如说社区治理就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为居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改名是迈出了第一步,改名以后职能是不是有扩大的地方?覆盖面是不是更广了?机制运转是不是程序化了?这是主要的看点。真正要通过改革实现职能的转变,政府职能服务于公共目的,服务于公共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社会管理。

现代快报:你怎么看“社会管

理的本质不是‘管’而是‘服务’”等观点?

竹立家:有一种观点叫“管理就是服务”,其涵义就是,政府在行为中,对社会公众的管理要更为人性化、服务化。“管理就是服务”在公共管理学内容里面,不能单纯理解,政府是进行服务,但是是管理型的服务,就是政府依法对社会进行公共管理。

现代快报:当下,社会管理创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是社会管理体制变革,这一改革或创新的深层次涵义是什么?

竹立家:现在说到社会管理创新,社会上有一种肤浅的了解,认为社会管理创新就是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就是管理或服务于群众等。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概念来讲,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社会结构性改革。换句话说,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就是要改变以前公共资源或公共价值分配不公,造成社会矛盾突出或问题突出的现象。这种结构性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配置的改革。对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解不能表面化、肤浅化。比如说,做群众工作主要的还是要以利益为导向来做。不是说,做群众工作和加强社会治安,就能解决目前社会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快报记者 刘方志

今日视点

“豆腐渣高速”只是质量问题,你信吗

投资87亿元的甘肃天定高速仅用了80多天就被迫停用大修,出现了坑槽、裂缝、沉降等重大问题,部分路段不得不铲除重铺。甘肃省新闻办27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天定高速公路路面出现病害系原材料、施工过程中和施工环境均不合格,1.2亿元返工费用将全部由施工单位承担。(9月27日中国广播网)

天定高速无论是在豆腐渣速度还是在程度上,都创造了新纪录。面对这个新纪录,人人心底都打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此低级的质量事故居然在国家级高速公路上出现,究竟是技术问题还是管理问题,是质量问题还是别有猫腻?人们希望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尽快深入调查原因,

并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可是,甘肃省很快就拿出了处理办法,速度当然不可谓不快,深入调查却根本谈不上。你看,甘肃省将豆腐渣高速简单认定为一起纯粹的质量事故,唯一的处理措施就是“1.2亿元返工费用将全部由施工单位承担”。可是,好好一条高速公路,80多天就要封路大修,这绝不仅仅只是一个修的问题啊,而是必须有责任人出来向公众道歉,并且接受惩罚。否则,修路出了此等严重问题,也不过是修修补补而已,今后谁还会重视工程质量呢?更何况,87亿的高速路,1.2亿的返工费真能修好如新,达到质量要求吗?

甘肃省交通厅官员张志勇此前曾信誓旦旦地说,“这与偷

工减料无关,没人敢在这方面做文章”。这种态度不得不让人怀疑,是不是交通管理部门对施工单位的有意包庇?仅是交通管理部门与施工企业的这种微妙关系,人们就有理由提出质疑:这里面是否存在寻租腐败的可能?要知道,同一个地方几任交通厅长先后落马都不是奇事,道路工程中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早已不鲜见,那么,豆腐渣高速背后的一干人等,果真就非常清白吗?

没人相信豆腐渣高速公路只是质量问题,这是我们从生活经验中得到的基本常识。甘肃省有关部门根本不对豆腐渣高速公路往贪污腐败的方面调查,难免会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高速公路是不会说话的,但是它会

实事求是地将质量问题反映出来;面对天定高速无言地诉说,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就是腐败导致豆腐渣,官方处理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地谈质量,只要求返工修路,不启动问责调查程序,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正如一个人生病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高速公路豆腐渣成那样,又岂能只是修修补补就万事大吉?某种意义上讲,每一个豆腐渣工程都是一封证据确凿的举报信。如果我们无视豆腐渣工程的举报,其实就是在纵容袒护腐败利益,结果必然是豆腐渣工程的泛滥成灾。是的,没人相信豆腐渣高速只是质量问题,公众有权要求相关部门对豆腐渣高速给出一个合理的交代。(舒圣祥)

热点纵论

拒绝安全套的高校令人大失所望

南京市栖霞区计生局在仙林几所高校进行青春健康教育工程时,曾向校方建议在校园安装安全套售卖机,然而得到的却是清一色的反对票。学校认为此举会给学生带来性暗示,更会纵容学生的性行为。

(9月27日《现代快报》)原本代表着思想自由、观念开放的高校,却以一句“性暗示”就断然拒绝了在校园安装安全套,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如此刻板的认识,犹如当年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一文中的洞见,国人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因此,鲁迅不得不叹服,“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

此跃进”。想不到若干年后,国粹依旧放光。我不是说不能“想”,而是觉得这种联想出自于高校管理者之口,甚至还把它当作一个冠名堂皇的理由说出来,就未免贻笑大方了。

对安全套的拒绝就是对性安全的无知。新闻中说得分明,我国每年平均有800余万例人工流产,而在流产女性中,女大学生令人尤为关注。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为让女学生不受流产之苦,安全套才走进校门。另外,从安全套历史来看,其对预防诸如艾滋病之类的性传播疾病,作用也是功不可没。

可见,安全套虽与性有涉,但它是为了保护而不是提供“性

暗示”。试想一下,若两情相悦,情到浓时,一切不可避免将要发生,作为校方,是希望学生能理智地使用安全套保护身体,还是顺其自然,甘冒怀孕或是染病的风险?

南京这几所高校的态度很明显,宁愿有风险,也要拒绝安全套。有此想法,大抵是因为在校方心目中,性是比较可怕的东西。可事实呢?正如孔子所言,食色性也。换言之,性和吃饭一样皆是人的本性。所以,教育者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性,才能拥有一颗平常心。

民国时期的性学家、北大教授张竞生就曾说过,“性譬如水,你怕人沉溺么?你就告诉他水的

道理与教会会游泳。故要使青年不至于去跳水寻死,最好就把性教育传给他。”近百年前张先生就提出的性教育观念,时至今日,一些高校却连一个安全套售卖机都不敢直面,连大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都要侵蚀,真是令人唏嘘。这样的高校,其性教育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我很难想象!而在一个缺乏正规性教育的氛围中,就无怪乎会出现这些拒绝安全套的高校!

前段时间教育部要求高校加强性心理教育,也是出于保护学生的考虑,如今这几所高校却连一个安全套售卖机都容不下,看来,要教育学生,得先摘下自己的有色眼镜才行。(庞震)

公民发言

贫困县免费教育还原了两层真相

“校舍好过县委大楼”,从今年秋季开学起,陕西宁陕县的所有学龄前儿童可以免费上幼儿园,这意味着该县开始实行15年免费教育。此次学前教育免费惠及全县2040名幼儿,其中包括来宁陕打工者的孩子。

(9月27日《京华时报》)

同样是位于陕西,吴起县早在2007年就开始实行包括3年高中和3年幼儿园在内的15年免费教育,而广东东莞石排镇更是在2010年宣布实施从幼儿园到博士的25年免费教育。如果说富裕的吴起县与石排镇推行免费教育是一种反馈,那么国家级贫困县宁陕的全民免费教育就更加体现了良心在教育中的分量。

贫困县免费教育,其实验证了一个真相:免费教育的成本并不算高。吴起县县委书记早就说过,该县全民免费教育一年的财政支出,仅相当于修一公里路。报道也显示,宁陕县推行15年免费教育,每年需要增加的投入也仅为240万元。

被贫困县的全民免费教育还原的,还有第二个真相:它不是“不可为”的问题,而是“不愿为”的问题。推行全民免费教育,并非财政不可负担之重,还能书写“人走官声在”的传奇。富裕地区不愿为之,甚至在贫困县先行后也不屑于效仿,只能说明一些地方的主政者根本不愿意在教育投入上用心思下功夫。

这样的反差,或许只有如下解释才是合理的:全民免费教育虽然惠及民众,但它的效果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相对于短期见效的政绩,它当然就不被许多官员所中意。对于这些官员来说,短期出政绩的高楼和广场,远比教育重要得多。宁陕县的实践,是对现有绩效考核体系的完善,也是一种倒逼——如果推行免费教育的主政者能够因为这个政绩受到提拔,那么,它对其他官员来说,就是一种最好的激励。(王聘)